

论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

曾绚琦

(漳州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佛教和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深受皇权统治的左右和影响。出于“大一统”的思想和“皇权至上”的理念,封建皇权统治者用多种手段牢牢主宰了这些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甚至对其最终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表明,历史、时代和阶级对文化传播起着制约作用。

〔关键词〕 宗教;佛教;基督教;皇权;宗教传播;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8X(2007)03-122-04

佛教和基督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先后于西汉末年和唐初传入中国。两者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排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等阶段。^{[1](P41-43)}同时,这些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历程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皇权统治对外来宗教传播的影响。下面通过对佛教、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历程的回顾来详细分析这些影响。

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三大宗教中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大约于公元一世纪两汉交替时逐渐从西域传入我国内地。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几经曲折和反复,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高峰和低谷。而这些起伏都与当时的皇权统治密切相关。

东晋时期佛教首次在中国盛行。当时作为统治集团的门阀世族已开始从顶峰走向衰落,而“八王之乱”所导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更加速了这个统治集团的衰败。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成员对于解决社会矛盾既没有信心也没有办法,只好转向更多关心个人的“生死解脱”等问题,而佛教对这类问题恰提供了颇起抚慰作用的解释。佛教不仅可以满足统治阶级内部的精神需要,同时也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用来缓和社会矛盾、麻痹人民大众的工具,因此其传播与发展获得了皇权的接纳。此时佛教的上层精英们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封建皇权对宗教命运的决定作用:佛教要存在与发展就必须妥善处理与封建皇权统治的关系。东晋时佛教领袖道安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梁高僧传·道安传》)明确地指出了皇权的支持对佛教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和佛教必须采取的妥协立场。东晋后期南方佛教领袖慧远在其所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如此论证出家僧人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慧远认为,如果使沙门(和尚)勤于修持,成就功德,就能使自己的六亲及至天下都得到好处,这完全符合当时皇权的政治利益。慧远的这种观点为佛教处理与统治阶级的关系确立了原则立场,有助于减少或避免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压制佛教的现象的发生。

东晋之后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皇族在内,统治阶级中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民间的

〔收稿日期〕2007-04-27

〔作者简介〕曾绚琦(1979-),女,广东省汕头市人,漳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教师,文学硕士。

名士也加入到信教的队伍，此时佛寺的修建和佛教著作的翻译、研究也十分兴盛。

隋唐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统治者对佛教的发展采取了支持的政策。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由于帝王的提倡，佛教大大发展，“天下之人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到了唐代时，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佛寺，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大量的高僧学者。唐高宗李治继位后，则在首都和各州均设立官寺。武则天更是下令各州设大云寺。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里，佛教僧人都受到礼遇，赏赐有加。

佛教在隋唐时期的盛行，使得当时出现了许多在佛学的义理研究上很有造诣的名僧，其中较典型的有名僧玄奘。他曾前往印度潜心学习各种佛教理论，并携带六百多部佛教典籍回到长安。他不仅将所携带回来的佛教典籍翻译成中文，而且将他西行的经历著成《大唐西域记》，这部作品是研究中亚和印度历史的重要典籍。玄奘弘扬佛教的愿望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与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亲自过问与支持有很大关系。而像玄奘这样大力弘扬佛教的僧人的出现，对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在唐代后期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禁佛的事件。唐武宗李炎在位时认为：佛教的盛行“蠹耗国风”、“诱惑人意”、“坏法害人”，（《旧唐书·武宗本纪》）对于以封建宗法制度为中心的名教纲常和道德规范构成了威胁；而且“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工；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旧唐书·武宗本纪》）使世俗地主的利益也受到损害，甚至发展到了皇权统治难以控制的地步。因此唐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打击。禁佛事件进一步使佛教的上层精英们认识到，皇帝和皇帝所代表的皇权对佛教传播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佛教在隋唐之后几个朝代的传播和发展情况基本上和上述情况相似，随着封建皇权支持与否起伏。佛教传播始终都遵循“必赖圣君贤相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21] (P1)}的原则，必须借助世俗政治权势的力量才能达到推广天下的目的。

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和佛教的传播情况类似，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经历了高峰和低谷，而峰谷的出现也均与当时的皇权有关。^[3]基督教的一个宗派——景教在唐初传入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记载，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一位名叫阿罗本（Alopen）的景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城长安，被唐皇“宾迎入内”，留在皇宫书殿内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披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唐高宗李治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封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此为景教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这使景门认识到，要在中土生存与发展，皇室的支持至关重要，因此开始千方百计地取悦皇室，甚至提出“圣上皆是神生”、“一切众生皆取圣上进止”（《序听迷诗所经》）的教义，从而很得皇家礼遇和庇护，一度颇为兴旺。然而，景教在唐王朝发展的终结也正是源于天子之怒。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灭佛风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骤然崩散，夭于一朝。

景教虽于唐末在内地灭绝殆尽，然而在北方边塞地区尚有延续。后来，该教在蒙古的乃蛮、汪古、克烈等部落中获得发展。蒙古诸汗的家人和宫廷里，多有景教的信奉者。蒙古人不但与景教有着密切缘分，而且早在其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以前，就与天主教方面有过直接接触。元世祖忽必烈在尚

未南下时,就曾以特别的兴趣和热情与天主教廷联络。随着忽必烈定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建立元朝,天主教自然受到尊崇,基督教在中国又时来运转,一度振兴。而元时的景教因为比天主教有基础,其势也颇显兴盛。元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重视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在元代的兴盛情况可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看出:“元世祖之母别吉太后,皇后乃马真氏与怯烈氏均为该教信徒。至于教堂,可谓遍布大江南北,不仅在北方燕京、甘州、宁夏广设传道机构,就是在南方镇江、杭州、泉州、扬州、温州等地也遍设教寺。”天主教廷则把发展在华传教事业主要寄托在元帝国“强大”皇权的宽容和支持上。教皇在写给忽必烈的书信中就曾说到:“如无陛下的帮助,派去的任何人都不能做出使至高无上的天主喜悦之事。”^{[4](P193)}他几乎是以乞求的口气,请这位中国皇帝关照和支持教士们的工作。这绝非只是表面的客套,也包含着发自内心的真诚。

元代以后,随着蒙古人统治的结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由盛转衰。而此时由于宋代以后儒教思想日臻完善,明代统治者对其他宗教的需求也开始降低,因此基督教逐渐被统治阶级抛弃和限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日渐衰落。直到明末清初,基督教才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掩护下得以重新在中国推广传播,此时基督教的传播实际上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扩张的结果。

三、皇权统治对外来宗教传播的影响

对佛教、基督教传播历史的回顾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古代中国的皇权统治对宗教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宗教的传播和发展。那么是什么导致这种结果的出现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皇权统治者“大一统”的理念和“皇权至上”的专制性。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安邦定国的前提条件是“统一”、“一致”。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害怕异己的思想,认为异己的思想会引起民众的动乱从而危及自己的统治。《吕氏春秋》中有这样的记载:“听群众议以治,国危无日矣。”“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有执一,所以博也。一则治,两则乱。”“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对于“异端”,每朝每代的统治者就采取及时消灭的态度,以此来保证国家的统一、统治地位的稳固。同时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实行皇帝“家天下”的制度,天下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皇权至上,一切大权归于皇帝,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利的象征。在这两种观念的作用下,自然而然会在文化传播领域形成“定于一尊”的一元格局。皇权在文化传播中处于主宰地位,统治阶级以文化一元来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

由于在古代传播技术落后、传播手段贫乏、传播渠道单一,宗教的传播基本只能通过各种宗教书籍的流传和僧人的讲学进行,而这两种传播手段却都可能受到皇权势力的牢牢控制。在古代中国,从商代开始统治阶级便对书籍的编纂与传播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政策,对于不利于统治的书籍大加禁毁。从西晋到南北朝时期就曾经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禁书事件,禁书的对象就包括佛经。北魏太武帝颁布的灭佛诏中有这样的内容:“诸有浮屠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二十四史·魏书》)此次毁佛经事件中受波及最严重的地区恰好是北方佛经翻译的一些重镇,因而给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一毁佛经事件是统治阶级控制佛教典籍传播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南北朝以后的各个朝代直至明清时期,统治阶级都从未松懈过对书籍的控制。在唐代,与书籍管理有关的条目被明确地写入国家法典《唐律》;在宋代,统治阶级对书籍的生产和流通都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几乎每个皇帝都颁布过禁令;到了清代,文字狱和禁书运动更是兴盛,军机处和地方政府先后颁发了各类《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和《违碍书目》等。^[5]

统治阶级对文化传播的专制还不仅仅体现在对书籍传播的严格管制上,同时也体现在对社会言论

的钳制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便已经意识到要关注和限制国人的言论。孔子的“正名”和“非礼勿言”是统治阶级控制言论传播的准则。商鞅提出了“壹言”的主张，要求统一舆论，认为私议官政不利于国家的政令统一。这些思想一直影响随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言论的控制，宽松的时期比较少，钳制言论的主张和措施不胜枚举。在这种情形下，宗教要通过僧人的讲学或其他言论途径进行传播殊为不易。

四、小 结

综上，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对文化传播管制如此森严的专制的皇权社会里，佛教、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大地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向皇权妥协，主动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取得他们的支持，中国古代的皇权统治对外来宗教的传播起着直接的制约和命运决定作用。佛教、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史便是宗教在世俗皇权的驾御下的衰荣史。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历史表明，文化的传播总是受到历史、时代和阶级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权力甚至能够最终决定着文化的命运。这些对于我们现在研究文化传播不无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陈登. 宗教传播与文化调适——关于佛教儒学化与基督教儒学化的比较研究[J].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 2001(3).
- [2]印光. 印光集·净土决疑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3]董丛林. 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4]阿·克·穆尔.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5]肖东发. 中国编辑出版史[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靳青万〕

The Spreading of Incoming Religion Culture Under Imperial Power in Ancient China

ZENG Xuan - qi

Abstract: As incoming religions,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were affected by imperial power deeply in ancient China. Under the idea of “Grand Unification” and “Imperial Power is Supreme”, the feudal imperial ruler firmly controlled the spreading of incoming religion culture with many kinds of methods. Imperial power even played the decisive role to final destiny of incoming religions. The spreading of incoming religion culture indicated that culture communication was restricted by history and social class deeply.

Key words: religion; Buddhism; Christianity; imperial power; religion spread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